

黃學海等著

PROFESSOR HOCKING H. H. WONG

PH. D., S. S. I.A.



尤德 與 香港的前景

新界租約與一九九七年

THE PROBLEMS OF HONG KONG



國際事務學院出版社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LLEGE PRESS

天德圖書

\$85.00

黃學海等著

尤德與香港的前景

新界租約與一九九七年

PROFESSOR HOCKING H. H. WONG, PH. D., S. S. I.A.

THE PROBLEMS OF HONG KONG

內容包括：

北京與倫敦的關係

中國大陸與香港之間

地方行政改革與區議會

香港的經濟貿易和工業

國際事務學院出版社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LLEGE PRESS

MARCH 1982

國際事務書院
國際關係研究所

黃學海：

尤德爵士在倫敦和北京的政治評價

中英關係——新界租約——香港的大限之期？

香港微妙的政治旅程

新任港督尤德爵士不但是英國一位權威的中國事務專家兼且是一位傑出的外交政策分析家。由七十年代開始他不論在台前或幕後，已經是中英兩國關係的橋樑（一九七四年被委任為倫敦駐北京全權大使）。

進入八十年代敏感的香港人在驚惶的政治意識中都担心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約滿後的所謂「大限之期」就快來臨，我們不妨翻查一下外交的記錄，自從一九六八年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十五年間倫敦和北京的關係被認為

是空前良好的，但香港的前景——依然在一個極微妙的政治旅程中。

香港面臨的三種抉擇

一九九七年距離今天亦只有十五年，對投資家來說是一個很短暫的時刻，我們試看麥理浩爵士出任港督十年，記憶猶同昨日，証明時光不會像電影故事一樣可以倒流七十年？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尤德爵士被英女皇委任為香港新總督，接替即將離任的麥理浩爵士，今後的尤德爵士將會是中港地區關係的基石，他能否在一九八二年開始把香港帶進一個更美好的前景是五百多萬市民對這位中國通的期望，一九九七年後的香港究竟怎樣？我們相信將會面臨三種抉擇：

- (1) 香港是否可以改為託管？
- (2) 香港是否可以變成特區？
- (3) 香港是否可以維持現狀？

邁向民主政治的程序

領土權屬於中國，法治權屬於英國的香港，十五年後中英兩國會面臨一個新的抉擇，領土權永遠屬於中國是必然的，但法治權是否繼續由英國去管理？北京和倫敦都需要尋求另一項新協議，在國際關係上不能避免，在外交法則上亦無可避免。

殖民地的年代在香港已一去永不復返，市政局出現民選議席是邁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現在積極推行的地方行政改革和區議會選舉是邁向民主政治的第二步。最近增設政務司分港九政務署，立法局遲早會出現民選議席，相信是邁向民主政治的第三步。

託管香港的外交神話

十五年後（一九九七年）的香港是否可以由「現行的制度」改為「託管的形式」？從國際組織和外交法則去分析：恐怕不會有這樣的外交神話在香港出現。

甚麼叫做託管？怎樣的情況下才可以把一個地區列為託管？通常來說是因為屬於這個地區的主權國已失去或放棄它對該區的保護權。

在外交協議中如果作彈性的解釋——「託管區」和「殖民地」並沒有多大的差異，相當於「保護國」與「附庸國」一樣。只不過是用在維護一個國家領土主權的尊嚴上比較適當的代名詞。

香港市民都有關心香港的責任和權利，為香港的未來提供意見是好的，但我們相信中共不會同意託管香港，我們也不相信英國會提出託管的要求。

鄧小平不見掌璽大臣

英國掌璽大臣艾堅斯今年一月曾訪問過北京，對新界租約問題不會有任何結論，是意料中的事（請參閱一月十一日工商日報、快報、萬人日報，筆者在國際事務協會（香港分會）研討會上的演辭）。

如果我們的判斷沒有錯誤的話，艾堅斯此行的外交任務，只不過是為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今年九月訪北京作適當的安排。這位掌璽大臣雖然身兼副外相，但他並不是倫敦派往北京為香港問題談判的特使，可能由於一些傳播媒介的過份渲染，往往令不少投資家產生過份的期望。

中共總理趙紫陽接見艾堅斯只不過是一種外交禮節而矣，但可以看出戴卓

爾夫人今年九月訪北京已成定局，除非英國在今年九月之前會出現一項對保守黨的現政權不信任案能夠獲得國會通過，戴卓爾夫人要面臨政敵的挑戰，倫敦和北京今次的高峯會議就會被逼改期。

從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總理趙紫陽在接見英國掌璽大臣艾堅斯時表示：北京對於香港問題目前未有具體的決定，這就是中共第一號強人鄧小平沒有安排會晤艾堅斯的原因。

香港問題擱置五十年？

爲了使投資者有真正的信心，一部份關心香港未來的人士認爲香港問題不妨擱置五十年後再作打算。在不抵觸中國主權的條件下暫時繼續由英國託管（見一月二十四日星島日報）。

這種看法我們不敢苟同，長期以來很多人都相信中共一定會以投資者的利益去衡量它對香港的政策兼且認爲投資者的動向可以影响中共對香港未來的態度，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並不排除經濟力量可以影响外交政策的可能性，但力量的對比是決定

政策的主要因素。區區五百多萬人的香港，屈指可數的一些投資者，對十億人的中國大陸整個經濟發展計劃能構成多大的影响？

實際上，中共對香港投資者的動向非常清楚，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競爭的中心，不論誰是香港法治權的執行者，只要他能夠確保這些廉價投資的狂利主義者，他們是不會撤出香港的。

中共必取消新界租約

新界租約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平等條約。中共故總理周恩來生前認為沒有必要在一九九七年之前中止英國在香港的法治權是基於北京要借重倫敦在西方外交政治舞台上的助力——也即是說倫敦和北京在互利的外交原則下延續了英國在香港的法治權，並非是投資者的力量能夠延續英國在香港的法治權，但不能否定亦有雙途並進的價值。

倘若將香港問題再擱置五十年，即是等於把新界租約再延續五十年。中共不但一定會拒絕，同時會宣佈取消新界租約，尋求另一項新的外交協議去解決香港問題。屆時我們相信社會組織、政制改革，確保投資者的利益將會是雙方

新外交協議中的先決條件。

尤德將會面對鄧小平

在時光不會倒流的衝擊中，倫敦應該怎樣主動向北京提出這一項有關香港問題的新外交協議？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外相卡靈頓今年九月官式訪問北京，面對中共強人鄧小平的時刻，相信是一個最重要的中國事務課題。

戴卓爾夫人和卡靈頓能夠應付鄧小平嗎？屆時在鄧小平身邊的除副總理黃華之外，恐怕還有一位最近復出的，前中共外長，曾經是基辛格的談判對手喬冠華，所以我們相信，曾任倫敦駐北京全權大使的新港督尤德爵士必然是在這一次會議中扮演有利於香港的重要角色（見今年一月二十三日筆者在新報、快報、萬人日報之評論）。也許有人會向身為殖民地總督是否可以參與外交談判？在外交法則是相當彈性的，如果這位殖民地總督是一位政務官出身當然不可能，但如果像麥理浩和尤德這兩位外交家出身的港督，特別是對亞洲問題和中國事務有深切瞭解相信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甚致可以說尤德爵士在中國事務方面恐怕要對戴卓爾夫人和卡靈頓外相作惡性的補習，當然戴卓爾夫人和卡靈

頓不會像前美國總統福特那樣，在訪問中國大陸的前兩個星期要加緊閱讀兩本有關現代化中國問題的專著，其中一本就是被卡達總統任命為美國駐日本全權大使，列根總統上台後繼續獲留任的美國國會亞洲問題專家萬斯菲爾的著作——「中國與遠東」。（按：萬斯菲爾曾任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委員兼在美國多間大學主講遠東問題。）

尤德無任期姬達怎樣？

新任港督尤德爵士的任期並沒有明確的規定，難免會令人意味到不容易排除的兩種可能性：

①曾經接受過一次心臟手術但已完全康復的尤德爵士（尤德爵士一九八一年八月曾接受過一次心臟手術），是否遵照醫生的提示盡量減輕工作的負擔，英女皇基於這一個原因所以對尤德爵士的任期採取了彈性的方式。

②曾經擔任過倫敦駐北京全權大使的尤德爵士加上先後四次在英國駐中國的大使館內工作，由於對中國事務有深切瞭解，可能在外交上引起另一種微妙因素？正如本書其中一位作者區顯華在談論中英關係時所提出的問題——前

華盛頓駐莫斯科全權大使（史達林時代肯南是美國最權威的蘇聯事務專家，肯南是美國戰後歷任駐蘇聯大使中唯一精通俄語可以不需要透過翻譯直接和史達林討論美蘇關係的外交家；就是因為他具備了這種條件不久就被史達林在不受歡迎的原則下要他返回華盛頓，改任國務院的蘇聯問題首席專家，同時在加州大學主講蘇聯及東歐事務。客觀來說，肯南比波蘭出生曾任卡達總統首席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布熱津斯基更加傑出（哥倫比亞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所長），布熱津斯基未能以俄語和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交談。

但另一個需要再作深入分析的問題是——史達林時代的美蘇關係和今天鄧小平時代的中英關係有極大的差別，以下是新港督尤德爵士四次在中國擔任工作的時間和職銜：

- A. 一九四七年派駐南京（其後駐北京）擔任三等秘書，
 - B. 一九五三年派駐北京擔任二等秘書，
 - C. 一九六〇年派駐北京擔任一等秘書，
 - D. 一九七四年出任倫敦駐北京全權大使。
- 被公認為中國事務專家的新港督尤德爵士畢業於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

院，精通華語，他是倫敦駐北京歷任大使中唯一不需要透過翻譯可以和北京領導人直接討論中英關係和香港問題的外交家。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院是英國研究現代中國和亞洲問題及非洲事務的著名學術機構。一九六五年筆者曾應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院邀請担任教席，主講現代中國課程，惜因病未成行。如果尤德爵士將來是因健康問題或另有更重要的工作，他的任期要縮短，我們相信最理想的繼任人一定是最熟識香港情況、瞭解中國事務、正在積極加強倫敦朝野關係的前任布政司現任港府駐倫敦辦事處專員的姬達爵士。

爲甚麼要寫這一本書

尤德爵士繼麥理浩爵士出任總督，香港的前景會更美好應該是毫無疑問。如果說香港是東方一塊可以容納五百多萬人的彈丸之地，倒不如說是南中國一個可以承擔五百多萬人的不夜之城。

我之所以要把這本書的英文名譯作（THE PROBLEMS OF HONG KONG）「香港的問題」是因為在政治上有極微妙的問題需要解決，在經濟上有應合作的問題需要加強，在社會上有將改革的問題需要進行。

未來的中英關係究竟怎樣？今後的中港關係又如何？地方行政改革和區議會的選舉代表甚麼？經濟發展和自由貿易競爭是香港生存的動力嗎？以上四個問題是香港人今天最關注的。

國際事務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十位高級研究生和十六位研究生特別就以上四個問題，在純學術的觀點上，全無政治立場的原則下，作出了力求客觀的評論；因為我們都是香港的市民，所以我們必須深入瞭解香港的問題。

國際事務學院校長
國際關係研究所長 黃學海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於香港



尤德爵士在倫敦招待記者

